“211 工程”三期项目“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
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地位研究

韩永利　著

商務印書館
201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地位研究/韩永利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000－3

Ⅰ.第… Ⅱ.韩… Ⅲ.抗日战争－研究－中国 Ⅳ.K2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413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地位研究

韩永利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000－3

2010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2
定价：28.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 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

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 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 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 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 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 12 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 3 至 9 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 至 18 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 年 2 月

前　言

自1978年张继平、胡德坤教授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团队、规划与设计研究目标和不断向前推进课题以来，我有幸能成为其中一员，尽自己所能作了一点研究和探讨。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及其对战后世界和平的影响，战时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东亚政策，战时中、美、英关系的演进是相对集中探讨的范畴。在研讨过程中，得益于校内外前辈学者的引导与鼓励、同辈学者的交流与磋商、青年学者和学生的帮助与支持，这些使笔者的研讨有所收获并继续走向深入。

收录于本文集的22篇论文是本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地位与作用研讨的一些体会和感想，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从世界整体发展层面作了深入思考，尤其是对从战前殖民体系的维持导致世界大战与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维护了世界总体和平局面进行了比较探察，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是世界大战的根源。

第二，比较集中地考察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为：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航路；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战略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战场与苏联战场、英美太平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西欧战场共同组成了相互支撑的

战场格局，共同推动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

第三，相对深入地考察了战时中美战略关系，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对美国“先德后日”战略成功实施起关键性作用；美国战时战略分为制定、调整、初步实施、完成的几个阶段，其成功实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中国的世界性战略地位的奠定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中美战时战略关系是相互支持的关系。

第四，探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东亚政策的演进历程，认为：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发展，美国东亚政策中具有双重的因素，对日绥靖中孕育着抗衡的趋向，对日抗衡中包含着绥靖的因素，总的发展方向是向着抗击日本法西斯方向发展，中国抗日战争是推动美国远东政策变化的最为基本的条件。

第五，初步扩展研讨了战时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认为：中国的抗战逆转了美、英、东亚及对华政策的传统轨迹，是改变中外近代以来不平等传统关系的开端，奠定了战时中国大国地位，进而赢得彻底民族独立解放的坚实基础。

第六，思考了中国持久抗战胜利与法国短期败降的原因和历史启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法一胜一败历史现象，说明民族凝聚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路线与政策、正确战略策略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性因素。

论文也反映了本人学术研讨的一个发展过程，即根据史料对以往某些观点作了改进和修改：如在中国抗战的推动下，美国东亚政策双重因素的出现早于以往本人界定的法国败降时期；再如美国首脑在战时战略制定时期对中国抗战地位就有一定战略思考，而不是我以往认为的完全忽略。这些都体现于历次发表的论文的论说之中，收入本文集时，基本保持原样，没有重大更动。

感谢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惠予本人论文集列入“211 工程”文集编撰计划之中，这对我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激励和推动。论文集肯定有许多不到之处，敬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韩永利

2008 年 1 月 11 日

世界整体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世界整体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强行输出商品、输出资本、抢占殖民地、瓜分世界的结果。但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看，这又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走向。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与导引这种发展的手段的残酷性与盲目性，共同构筑了整体世界发展初期的矛盾性特征。这种特征使世界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开始连成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体，同时它又导引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形成世界整体发展初级阶段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瓜分、再瓜分的恶性循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以英法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世界殖民体系以武力手段的首次强行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德、意、日法西斯对该体系的再次冲击。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异，特别是在结果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冲击的目的则是一样的，即：在旧的世界框架内实行再分配，并非推倒该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以殖民主义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源于这一根本因素。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呈现出老牌殖民帝国控制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工业文明的世界扩展需要在交换方面有更为自由的、更为宽松的国际结构，而另一方面，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又在各自控制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画地为牢，将世界分割开来，这种矛盾状况与世界整体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不可能长期持续。尽管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就预示了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由更高社会形态所取代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改良主张和势力也未形成。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只能在旧结构的混沌中碰撞、徘徊，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实力较量。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矛盾冲突的最高形式而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老殖民帝国主义内部的一场恶斗，它产生的结果是：第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首先在一国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实践的坚实基地并为其他国家树立样板，而世界大战则客观上成为了这种实践的催生婆。第二，促使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个运动，追随十月革命的实践，成为动摇和削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强大而具有经久活力的历史潮流。第三，由于以英法为代表的殖民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而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殖民体系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严重桎梏。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崛起，资产阶级开始寻求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途径，出现美国牌的改良主义，其开端为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这个计划既是美国欲取代英法霸权的宣言，同时也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为挽救自身发展困境推出的新途径。其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

提供的机会对威尔逊的设想进行了实施，并构筑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

以上几点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结果，同时也是一战前所没有的新气象。其意义在于：第一，标志着世界殖民帝国主义走向衰亡的开始，因为这种体系严重地阻碍了整体世界发展的进程，人类开始寻求新的方式进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的继续向前推进。第二，这几种相对于殖民主义体系而生的新因素，标志着人类制止、避免或延缓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积极开端，显示出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潜在力量，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而猛烈的博弈中，这种力量得到世界性的扩展。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扩张的大体完成是整体世界发展的起端，而这个起端又是以世界殖民化过程作为标志的，而世界大战则是和世界殖民体系紧密相随。因为，殖民体系，又曰帝国主义将世界瓜分完毕，造成了整体世界发展初期的表面整体性与实际分割状态的尖锐矛盾，严重地阻碍着世界生产力发展。从世界整体发展而言，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居于主导地位的正是世界范围内殖民地的分割并形成体系，制约着其他特征，尤其是金融资本的世界性流动与商业贸易空间真正全球性的拓展。可以肯定，殖民体系阻碍了资本主义进一步世界化的进程，蕴藏着严重的世界危机，尤其是导致了殖民势力范围的再瓜分，从而恶性发展到世界性的战争。

二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动摇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但是未能摧垮这一体系。英法等老牌殖民宗主国仍然维持着殖民帝国，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总体构架。而这种主导，主要依靠着强大

的军事实力，英国海军与法国陆军。而这种体系维护的后果是：

第一，英法等国以传统的方式，剥夺了战败国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同时又极为残酷地将战争恶果转嫁到德国人民身上，诸如战争赔款、割让领土等，使德国沦为殖民地状态。这种并非基于消除战争根源积极意义之上的对一个工业大国加以高压并促其臣服，并演化为对一个民族的无情盘剥，同时对其战争机器与国家体制这一祸源又采取放纵利用的处理方式，其后果只有一个，就是为新的世界战争植下新的祸根，埋下煽动民族仇恨的种子。这是在殖民体系框架内处理战后问题的必然结果。

英法主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问题的处理表明其在战后世界重建上不可能脱出殖民体系的旧套路，不可能以相对和平的手段，即以强大经济实力进行国际市场的竞争，这是和英法依赖于殖民经济的自身国力走向衰弱的总体趋势相联结的。因此，尽力维持住殖民帝国，以势力范围限制他国的经济冲击，以及以军事力量确保殖民体系的生存，就成为一战后英法处理国际事务的两个杀手锏。而这种传统方式的运用，集中反映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重新崛起的整个过程。换言之，德国的重新崛起的目标由于一战后对其处理的隐患，以及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所陷入的发展困境而极为单一，这就是必须摧垮英法帝国，寻求所谓“生存空间”，建立德意志大帝国。而摧垮旧有殖民帝国的手段则是重振军备，向战后主要以武力手段维持殖民体系的英法发起挑战和瓦解“凡尔赛体系”。东亚的日本奉行与德国相同的目标，寻找机会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殖民帝国，率先发起了以颠覆“华盛顿体系”为目的的侵华战争。

应该指出的是，德、意、日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主导国发起挑战和冲击的目标和手段，基本上属于殖民体系内部的恶性循环，如果它们的冲击成功，不可避免地将建立起类似于英法主导的殖民体

系，即殖民体系易主而已，而且更为落后与野蛮，因为这是由德、意、日本国落后的政体所决定的。这种冲击，就目标和手段看，与整体世界的发展背道而驰。但是，历史却戏剧性地使这种冲击成为彻底埋葬世界殖民体系的重要起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观之，法西斯国家的武力侵略尽管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而根本原因是以英法为首的殖民体系的维持，以及维持这种体系的过时目标和僵硬而无力的应对方略引起了法西斯战火的蔓延。

第二，人们习惯于将 20 世纪 30 年代所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作为二战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当然是考察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将这一问题放在整个 20 世纪并将目光投向 21 世纪初来探察，就不难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走向或者说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也爆发了多次经济危机，但是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仍然应归因于战前国际政治经济构架的全面腐朽和没落。在对付当时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体系暴露出了无法挽救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应对危机过程中主导国际事务的殖民宗主国与利益相关国的传统方式。

资本主义世界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短暂的“虚假繁荣”和相对稳定之后，马上回复到束缚世界整体发展的狭途，其世界经济运作中的殖民地瓜分的根本弊端暴露无遗，其触点则是经济大危机。而危机的解决或者说避免恶性发展，有赖于资本世界扩张空间的真正开阔，以及构建一个有别于殖民体系促进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机制。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的是穷途末路的一片恐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显示了资本主义暂时还可以通过改良措施以及国内机制的转换走出危机，延缓生存。罗斯福“新政”的

相对成功：一是因为对国内机制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二是通过新政外交“睦邻政策”稳定了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具有远离欧亚地缘优势的，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拉相对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三是得益于利用纷繁的国际形势实施左右逢源的全方位经济，如维护与英法等国传统关系，并在其势力范围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所得；与苏联建交，推进美苏经济关系；甚至长时期地维持与德日紧密的经济关系。

可以说，相对于英法，美国无论从地域、传统关系，还是国际处境上来说，活动空间要自由得多。尽管如此，美国在当时的国际构架下不可能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体困境。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付世界性经济危机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殖民体系框架下运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后，使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战：贸易战、关税战、货币战等。这种经济大战是在实际分割着的世界中进行的。各资本主义殖民大国依据自己控制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设立排他性的贸易区、关税区、货币集团，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而且也决定了国际社会无法摆脱危机局面的最终结果。随着经济大战愈演愈烈，危机也迅速迈向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而使用武力决定问题的程度。而早有战争意向和准备的德、意、日等国正是利用了这种国际环境大力发展军备，通过局部战争夺取老牌殖民宗主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最后发展到全面战争，企图达到殖民势力范围重新分配的目的。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维持，极大地束缚了与整体世界发展大体相适应的新因素的发展，也削弱了这些新因素对世界大战的制约能力。

首先，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制约新的世界大战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偏见，也由于苏俄率先废除沙俄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鼓励民族

解放和独立，因此，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持极为仇视的态度，其国际经济战略和政治战略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摧垮苏联。在法西斯局部战争阶段，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希望这股祸水流向苏联。英、法、美等国决策者也多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建立欧洲和亚洲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反苏反共、维护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观念模糊了他们对共同面对的主要敌人和共同面临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认识。其结果，英、法、美、苏大国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形成对付法西斯国家的合力，反而在局部战争阶段被法西斯国家分化，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是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其次，由于十月革命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极大地动摇了殖民体系的根基，因此，反苏反共的意识又扩展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反抗侵略斗争的漠视。维护殖民统治的观念使得英法等国，特别是英国在对付法西斯战火蔓延问题上找不出除了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之外更好的办法。英法绥靖政策发端于日本侵略中国，扩展到在殖民体系中处于依附状态的所有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弱小国家。最后，英、法、美大国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几乎丧失殆尽，自身分别被拖进世界大战。

再次，殖民体系的维持加深了英法等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作为一战后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美国希望依靠经济实力取代英法成为世界霸主。在如何使资本国际化的途径上，美国有别于传统英法殖民帝国。与德日以落后方式打破二战前现存国际结构不同，美国则是主要以经济竞争的方式力图冲破传统殖民体系的藩篱。美国有政治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从一战以及战争导引革命中察觉到殖民体系的构架无法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存，从而力图寻求出路。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新政”，以及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都表明了美国的这种追求。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想以更高明的办法来挽救

资本主义生存。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种努力，与以英法为代表的殖民体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欧洲对德问题上，其结果是德国的重新崛起。到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局部战争蔓延之时，美国与英法为主导的国联之间也无法协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以孤立主义为借口“中立”于欧亚战火，听任德意日对英法殖民帝国的蚕食，希图坐收渔人之利，达到战胜德意日和取代英法世界主导地位的双重目的。英美之间在法西斯兴起时相互间的矛盾，在欧洲反映为德国获取了建立日后战胜英法、横扫西欧的有利机会和地势。日本则在亚洲获取了从中国内地步步南下，日后进一步发动太平洋战争，横扫英法等殖民宗主国在亚太核心地域东南亚的有利机会和地势。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就其根本点来讲，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实际要求与殖民体系构架不协调造成的，由于制约战争的因素还极为弱小，加之在殖民体系下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开拓生产力发展道路的目的，以剧烈战争手段冲破旧体系的束缚就成为唯一结局。这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体世界继续前行的必然走势。

三

列宁指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特征的极为精辟的论断。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列宁是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特征而言的。从历史发展观之，这个特征主要的是以帝国主义瓜分完世界，即殖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到顶端，进而引发世界战争而言的。正是殖民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再瓜分，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分配与再分配的恶性循环，导致了两次世